

# 讀

取古人宗社之安危，代为之忧患，而已之去危以即安者在矣。

朱永嘉 著

# 史

- ◆ 关于中央巡视员制度的历史回顾
- ◆ 关于北宋高薪养廉
- ◆ 关于小人物和大人物
- ◆ 漫谈中国古代的漏泄禁中语
- ◆ 漫谈中国历史上的冤案、错案和疑案
- ◆ 朱元璋怎样教育自己的子孙
- ◆ 有感于修史难，官修更难

# 求是

为官

为政

为人

沟通古今

应对现实

镜鉴

讀

史

史

求是

求是學社  
求是出版社

讀

史求是(913) 台灣張其成評

史  
求  
是

朱永嘉  
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读史求是 / 朱永嘉著. —北京: 中国长安出版社,  
2014.9  
ISBN 978-7-5107-0778-0  
I. ①读… II. ①朱… III. ①中国历史—通俗读物  
IV. ①K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16515 号

## 读史求是

朱永嘉 著

---

选题策划 何崇吉  
责任编辑 李 多  
特约编辑 李春博  
出 版 中国长安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东城区北池子大街 14 号 (100006)  
网 址 <http://www.ccapress.com>  
邮 箱 [capress@163.com](mailto:capress@163.com)  
发 行 中国长安出版社 全国新华书店  
电 话 (010)85099947 85099948  
印 刷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4  
字 数 309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书 号 ISBN 978-7-5107-0778-0  
定 价 48.00 元

中国问题的答案，  
仍然离不开中国的历史。

## 序 言

记得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提出要我们全党的学习方法与学习制度改造一下，具体地说，他提出的两条办法，一条是研究现状，另一条是研究历史。然后他还讲到我们学习的态度，他说我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必须抱着“有的放矢”的态度，这个“的”就是中国革命的实际，“矢”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还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实际情况出发，从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物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从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因而这种结论，才是科学的结论，“这种态度，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

毛主席提倡实事求是的态度，这个典故是从中国历史上来的，具体地讲，出自《汉书·河间献王传》，其中讲到汉景帝的儿子刘德被封为河间献王，史称其“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所以实事求是与研究历史二者之间有紧密的联系。毛主席为什么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指出改造学风的第一条是研究现状，第二条便是研究历史呢？那是因为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是我们处理现实问题不可或缺的参照系数。建国以后，毛主席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用大量的时间来读书，通读有四千万字的《二十四史》，通读《资治通鉴》十多遍。他为什么花费那么多时间去阅读历史，因为要管理好这个国家，现在叫治理。你不懂得这个国家的历史，怎么能处理好国家大事呢？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天天通过报纸、刊物、情况简报和参加各种会议，呈现在你面前，如何处理好这些问题，便要借鉴历史上的经验，那就是以史为鉴。故读史书、研究历史也有很强的目的性，这个目的便是借鉴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为现实生活寻找可以借鉴的参照系数。

在读史的过程中，如何借鉴古人的经验和教训以资今日国家之治理呢？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之叙论四中讲到读史之时，曾经说：“设身于古之时势，为己之所躬逢。研虑于古之谋为，为己之所身任。取古人宗社之安危，代为之忧患，而已之去危以即安者在矣；取古昔民情之利病，代为之斟酌，而今之兴利以除害者在矣。”这告诉我们，读史要设身处地进入古人的角色，代其思虑，不仅知其成败得失的结果，而且要探究其事态发展之所以然，这样古人之成败得失皆足以为后人之鉴戒矣。从知其然到知其所以然，便有一个分析探求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实事求是的过程。在读史的过程中，能做到这一点的话，那么古人之“得可资，失亦可资也；同可资，异亦可资也。故治之所资，惟在一心，而史特其鉴也。”这里所谓“惟在一心”便是读史的过程，学者要用心去探求其所以然，通晓这个所以然才能为你处理现实问题提供鉴戒的参考。

故能不能有所鉴戒的关键，不在于知其然，知道历史事件的结果，而在于知其所以然。为此，王夫之进一步说：“故论鉴者，于其得也，必推其所以得；于其失也，而必推其所以失。其得也，必思易其迹而何以亦得；其失也，必思就其偏而何以救失；乃可为治之资，而不仅如鉴之徒悬于室，无与炤之者也。”这里既提出了知其所以然的过程，还要反复推敲，设想各种可能性及其不同的结果，并比较其各自成败得失之可能，这便是举一反三的过程。这样作为处理现实问题之参照，便可能有多种方案和设想，便于选择。同时在鉴戒史事时，还必须懂得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条件。他说：“以古之制，治古之天下，而未可概之今日者，君子不以立事；以今之宜，治今之天下，而非可必之后日者，君子不以垂法。”这是告诉我们鉴戒历史经验，也不能照抄照搬，还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对历史经验的参照只能是如此，昨天、今天、明天之间，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治理的方法应该也有所变化，不能拿昨天的东西来完全否定今天，也不能用今天的是非来否定昨天的是非。如何读史，毛主席强调“古为今用”，这与明末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三大思想家的经世致用一脉相承，它以史学为根据，而推之于当世之务。要做到这一点，那必须对古今两头都要有相当的造诣，他花那么多精力去通读《二十四史》，反复地读《资治通鉴》，到了晚年，他拿着《通鉴》说自己读了许多遍，还想再通读一遍，只是没有那么多时间了。正因为他对历史非常熟悉，许多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都能信手拈来，为自己所用。

这本文选，一共选了四十余篇文章，没有按文章在博客上发表的时间次序排列，而是分类排列为五组，从时间上看，最早的一篇是在二〇〇八年的十二月二十六日，最迟的一篇是在二〇一三年的六月间，前后历时四年半。

二〇一四年十月



# 目 录

序言 1

## 辑一 | 古为今用

关于中央巡视员制度的历史回顾 2

由“人肉搜索”的热议想起历史上的“御史风闻” 10

从上访新闻想到登闻鼓及唐代门下省的拾遗补阙与杜甫和白居易 17

关于中国古代地方监察制度 25

关于地方监察失效问题 45

浅论中国古代和当代的回避制度 50

漫谈中国古代的漏泄禁中语 56

漫谈中国历史上的冤案、错案和疑案 63

《论秦始皇》是“逢君之恶”吗？ 75

## 辑二 | 文化漫谈

文化是什么，文化何以强国？ 86

漫谈忧患意识 99

再谈忧患意识 107

谈谈古代几对著名的父子以及卢武铉的高山跳崖 114

朱元璋怎样教育自己的子孙 131

再说朱元璋如何悉心对儿孙的教育和培养 136

- 养老、尊老与青年的教育 144  
关于中国历史上的迁都问题 153  
释革命 156  
有感于修史难，官修更难 163

### 辑三 | 读汉唐古文

- 不患贫而患不均——读《春秋繁露·度制》有感之一 180  
君子不尽利以遗民——读《春秋繁露·度制》有感之二 187  
以仁安人，以义正我——读《春秋繁露·度制》有感之三 194  
读柳宗元的《诫惧箴》与《忧箴》 200  
读《诗·硕鼠》与柳宗元的《永某氏之鼠》有感 207  
读《敌戒》 210  
柳宗元笔下的国子监太学与司业阳城 214  
阳城在道州 222  
从“不平则鸣”谈韩愈的《送穷文》 229  
读《毛颖传》 236

### 辑四 | 随笔札记

- 关于小人物和大人物 242  
关于宣室的两个故事 249  
说一个空谈误国的典型案例 252

- 关于王衍清谈的来历 255
- 关于宇文泰与苏绰的对话 260
- 从冯道说到鲁褒的《钱神论》 277
- 疏广、徐勉、姚崇 283
- 关于寇准二三事 287
- 关于北宋高薪养廉 294
- 皇明祖训——不征国 304
- 复社纪事 306
- 狱中读书札记之一 314
- 狱中读书札记之二 317
- 狱中读书札记之三 321

## 辑五 | 知人论世

- 说说王安石、司马光、苏轼之间的君子之交 326
- 王安石与苏轼在政治哲学上的两种不同思路 332
- 再释陈守实师《读蔡著王荆公年谱考略》一文 341
- 蔡上翔的《王荆公年谱考略》与邵伯温的《辨奸论》 351
- 周予同先生的为人和为学 355

## 辑一 古为今用

---

古为今用，这本来是应有之义，但这也有前提，必须先弄清“古”的本来面目，“今”所遇到的问题是什么，才能“古为今用”。各个时代的人物都是根据他所处时代及面临的社会矛盾，借历史的经验教训，为处理现实问题寻找适合自己需要的参照系，使历史与未来在现实矛盾中寻找一个契合点，为解决现实生活中的矛盾，为未来社会的建设，提供一个较好的方案。

## 关于中央巡视员制度的历史回顾

在今年五月十七日，王岐山在中央巡视工作动员暨培训会议讲话时，强调中央巡视组要当好党中央的“千里眼”，找出老虎、苍蝇，对违法违纪问题早发现、早报告。

中央政府派巡视员到地方巡视考察地方行政中的问题，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老传统。秦汉以来，历朝历代都有这方面的建制。巡视工作在中共党史上，亦有传统。早在一九三一年，中央便派员巡视地方的组织。建国以后设置的巡视制度，最早可追溯至一九九六年。作为巡视工作的制度化，则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二〇〇三年八月，正式成立中央巡视组。那时建立了五个巡视组，十二月颁布《党内监督条例》对巡视组的工作作出明确规定。二〇〇七年在中央正式设置巡视工作办公室，下辖十一个巡视组。二〇〇九年七月则正式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二〇一〇年把巡视工作扩大到军队。现在巡视工作的范围，除了地方行政区域外，还包括中央各部。巡视工作的重点也有变化。在二〇〇三年十七大修改党章时，巡视工作的重点放在地方党政机关贯彻执行中央方针路线状况上，而今巡视工作的重点则把反腐败、以权谋私、

贪污贿赂放在第一位，重点放在发现“老虎”和“苍蝇”，把做中央的耳目官放在第一位了。从建党和建国以来的历史看，巡视工作的重点是随着形势的发展而不断深化的。

秦灭六国以后，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到了汉代，一是疆域扩大了，二是郡、国的范围划小了。到汉末郡国有一百零三，那时的郡国相当于现在地市一级，县邑是一千三百一十四，相当于现在县级。汉时中央与地方郡守的考察主要是通过各郡岁终的计簿，地方官报告一年政绩的状况，然后郡太守的升迁黜陟则以上计考课的次第为准。可见现在地方官关心他任内的政绩工程这个观念由来已久。因为这些政绩既关系到他们仕途的上升空间，也间接关系到他们的“钱途”。在汉代，那时郡太守每年上报的计簿是否正确，是否有虚报的数字，丞相和御史大夫无法一一到那一百零三个郡国去具体核对，而且汉代郡守与尉在地方上的权力很大，他们可以直接辟除自己的属吏，他们在地方上有人事权，还有每年向朝廷推荐贤良方正的权力，对地方上的刑事案件有生杀予夺的权力。尉则有兵权，而财权也由地方直接掌控。所以哪个郡太守飞扬跋扈，他完全可以一手遮天，任意的营私舞弊、贪赃纳贿。中央下达的政策，他们完全可以采取各种应付的对策。故朝廷的政策到了地方上具体的执行单位完全变样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做法也是历史悠久。另一原因是地方上恶势力猖獗，地方豪强欺压百姓，社会动荡不安。在这个背景下，促使汉武帝下决心，派遣十三州刺史，巡视地方行政工作。

汉武帝设置十三部刺史的时间，《汉书·武帝纪》系在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初置刺史部十三州”。一部之刺史，分管和巡视所辖之七、八个郡国。颜师古注引《汉旧仪》云：“初分十三州，假刺史，

常以秋分行部，御史为驾四封乘传。所到部，郡国各遣吏一人迎界上，所察六条。”这里郡太守的秩是二千石，而刺史秩只有六百石。这里也是以小人物制衡大人物。至于所察六条，指刺史到郡国巡视的职责和范围。《资治通鉴》注引《汉旧仪》称：

一条，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这一条是对地方恶势力而言。）二条，二千石不奉诏书、尊承典制，背公向私，旁诏守利，侵渔百姓，聚敛为奸。（这一条是考察地方郡太守有没有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还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利用权力谋取官员私利，侵占百姓的田宅，造大房子。现在是造大办公楼，连土地庙都巍峨高大，那就只能聚敛财物，苦了百姓。）二千石不恤疑狱，风厉杀人，怒则任刑，喜则任赏，烦扰苛暴，剥戮黎元，为百姓所疾；（那时地方上刑事和民事的裁判权都在郡太守一人手上，地方上有冤假错案要追究郡太守的责任。怒则任刑，是指滥用刑罚搞逼供信，制造冤杀错判等种种为百姓所痛恶的苛暴劣政。）四条，二千石选置不平，苟阿所爱，蔽贤宠顽。（这一条是指地方官任人唯亲，在选任官职时搞近亲繁殖，搞变相的世袭制。）五条，二千石子弟恃怙荣势，请托所监。（这一条是指官员的子弟，也就是今所谓之“官二代”，利用父兄的权势，在地方上为非作歹，包揽和请托词讼。）六条，二千石违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货赂，割损政令。（这一条是指地方官与黑恶势力相勾结，权钱交易，接受贿赂，违背政策法令审批项目。）

从刺史在地方上巡视的这六条职能看，都是对着官员及其子弟和地方黑恶势力为非作歹的行为，维护弱者的利益。这六条与王岐山在今年五月十七日所讲的巡视工作要突出的四个重点在方向上是基本一致的吧。

汉代的刺史，一般在秋天八月巡行郡国。岁末到京师报告巡行郡国的结果。汉代有不少刺史巡视郡国的记载。如《汉书·朱博传》（卷八十三）云：

（朱博）为刺史行部，吏民数百人遮道自言，官寺尽满。从事白请且留此县录见诸自言者，事毕乃发，欲以观试博。博心知之，告外趣驾。既白驾办，博出就车见自言者，使从事明敕告吏民：“欲言县丞尉者，刺史不察黄绶，各自诣郡。欲言二千石墨绶长吏者，使者行部还，诣治所。其民为吏所冤，及言盗贼辞讼事，各使属其部从事。”博驻车决遣，四五百人皆罢去。

这里“从事”是郡县的属官。此言朱博为刺史时，行部于冀州，经过一个县。这个县的从事考验一下刺史是否懂事，故意在县衙门招揽了数百人拦路告状。朱博的态度是刺史巡视只考察官员行事的问题，不代替地方官处理政务。故对县内众人讲，你们告县吏，即指穿黄绶的，应该到郡太守那儿去告。如果是告郡太守的，指穿墨绶的长吏，那么等到他巡视经过那个地方，你们再来告。他要巡视的郡有七八个之多，今天只是路过这里。至于你们所受的委屈和贼盗辞讼，那么请到所属的地方去告。朱博由此自冀州刺史迁为并州刺史，然后迁为琅玕太守。可见刺史在政治上的地位低于一郡的太守。那时高官中，做过地方刺史的人不少，如翟方进便做过朔方刺史。唐人戴叔伦《抚州刺史庭壁记》称：“汉置十三部刺史，以察举天下非法，通籍殿中，乘传奏事，居靡定处，权不牧人。”如果要对比的话，与当今中央巡视员有相似之处。东汉末年这个情况发生变化，刺史成为州一级的地方行政官员，在其州范围内的郡与县皆直接受其管辖。刺史的性质也变了，他不再是巡视员，而是州一级的地方行政官员。



## 二

唐代地方行政机构的设置是承隋而来的。魏晋南北朝时，仍东汉之末，都处于州、郡、县三级行政结构。由于南北对峙，北齐、北周东西并立，各方的疆域缩小了，人口也大幅减少了。但南北各方的州、郡合起来的数量却愈来愈多，出现了十羊九牧的局面，政府机构膨胀，人浮于事，百姓不胜负担。隋文帝开皇三年（公元五八三年）下决心把地方行政机构由三级制改为二级制，省去郡一级，由州直接统县。到隋炀帝时，又“罢州置郡”。这只是名称的改变，由州县二级变成郡县二级。炀帝大业年间，全国置郡一百九十，县一千二百五十，户八百九十万七千五百四十六，国四千六百零一万九千九百五十六，平均下来每个县七千多户，每个郡平均六七个县。到了唐高祖李渊又改郡为州，改太守为刺史。这二次都只是名称上的变化，地方行政机构二级管理的体制没有变。至唐太宗贞观十三年（公元六三九年），全国有州、府三百五十个，县一千五百十个。州、府这一级比隋时增加了一倍。县的数量虽然有增加，但不多。实际上是州、府的规模小了。州的划小，可以防止尾大不掉的局面，但从中央政府，如何直接管理这么多州府，也增加了困难。而直接的亲民之官则是州、县这二级地方官。所以对三百五十八个州的刺史之考察成为中央政府必须面对的一项难题。《贞观政要·择官》记载了李世民发自肺腑的一番话。时间是在贞观二年（公元六二八年）：

朕每夜恒思百姓间事，或至夜半不寐。惟恐都督、刺史堪养百姓以否。故於屏风上录其姓名，坐卧恒看，在官如有善事，亦具列于名下。朕居深官之中，视听不能及远，所委者惟都督、刺史，此辈实治乱所系，尤须得人。

刺史，是州的地方长官，都督是地方掌兵的官。它是跨若干州的，